



杭州互联网法院如何“网”出新时代

本报记者 张雪南 陈晓青 高敏

澎湃大潮起钱江,杭州钱江新城的钱潮路以此得名。坐落钱潮路22号,一场持续深化的互联网司法改革,6年来一直备受瞩目。

2017年6月26日,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六次会议,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》。同年8月18日,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成立。以此为标志,一个新的司法时代呼啸而来,并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。

6年间,这场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果;未来,杭州互联网法院又将锚定哪些新目标?日前,记者走进杭州互联网法院寻求答案。

—

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,是世界司法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,被誉为“司法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”。它不是简单的“互联网+司法”,而是让法官办案从形式到内容、从手段到对象都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。有人说,互联网法院就像一盏灯,“一经点燃,就不会只照亮房间的一角”。“这盏灯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?在追求

便利、快捷、交互、开放、个性的互联网时代,它又如何快速适应,将光亮照射每一个角落?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实时在线的“数智大脑”上,我们读出了它的与众不同——

一是集中管辖体系下,办案有了新“解法”。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特定类型涉互联网案件,6年来,共收到立案申请204953件,有近三分之二的案子用互联网方式化解在诉前,仅三分之一要通过开庭、裁判的审判流程解决。诉前怎么“解”?依靠大数据,互联网法院与行政执法、人民调解、公证机关建立起无缝数据对接,构建起一个以法院为终端、漏斗型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。在集中管辖体系下,互联网法院将类案统一适用标准和裁判尺度,并由此探索出智能化审判辅助工具,也就是“算法”。如一个案件到了互联网法院,“算法”还能对双方当事人“算”出最优调解方案。

二是突破时空限制,打官司像网络购物一样便捷。互联网24小时“不打烊”,法院也是。在这里,打官司“零在途时间”“零差旅费用”。用时短,涉互联网纠纷标的

的中年人占22.9%;“熬夜党”,申请立案的高峰时段是在凌晨1点到2点,白天的第一波高峰则出现在下午4点到6点,当事人可以在业余时间实现网上诉讼。

三是出圈的案子多,大案要案也多。互联网的复杂多样,必然带来治理的复杂。6年来,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案件数量逐年增长,涉及法律问题新型、复杂、疑难,首案多、要案也多,一批典型案例,发挥了定标尺、明边界、促治理的审判职能作用,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。其中,有43个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或评选的各类报告、案例、奖项和汇编的案例书籍。如“平等就业权纠纷案”,旗帜鲜明地否定就业歧视行为,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32批指导性案例,被写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。

—

数据背后,是对审判效能的追求,也是对互联网司法诉讼规则的大胆突破。

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之初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明确赋予其“提升审判效能”“完善审理机制”“探索案件诉讼规则”“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”等四项任务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仪式上首次提出“互联网司

法”的概念,强调“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、新经验,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作出积极贡献”。这是杭州互联网法院不变的职责与使命。

6年的探索实践,杭州互联网法院推出了哪些影响广泛、特色鲜明、富有成效的标志性成果,为互联网发展治理之路提供有效借鉴?

还记得2017年8月18日,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,成为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。当天,法院审理了第一案——《后宫甄嬛传》作者状告网易侵犯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。一个屏幕,半个小时,案件审理完毕。原告位于杭州、被告位于北京,互联网法院让“网上纠纷网上了”变成现实。

到今天,“网上纠纷网上了”已是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日常。更多更深层次的探索是,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统司法的一些桎梏,解决了漫长的诉讼过程、案多人少的矛盾、居高不下的诉讼成本等困境。而参与诉讼,不限时间、不限地点、全程留痕等特点,也大幅提升了司法的透明度,让老百姓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当事人获得感的“加法”和司法效率的“乘法”的背后,是一项又一项在全国领先的创新,它不经改变法院的“打法”也影响着互联网司法的进程。

(下转2版)



亚运车道来啦



近日,杭州市区部分道路路面上出现了印有“亚运车道”的标识标牌。这类亚运车道将在杭州亚运会期间正式启用,以确保亚运赛事车辆优先通行。据了解,目前杭州市区内的各条亚运专用车道,还在陆续布置完善中,部分已经完成建设。专用车道分布在地面道路和高架快速路,在正式启用前,它仍将发挥普通道路的作用,司机可以放心驶入。

董旭明 摄

后陈村,何以成为“明星村”

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朱晓婷

这两天,雨一直断断续续地下,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老办公楼的来访者、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。早在2004年6月18日,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这幢楼里诞生,开启了基层民主监督的先河。如今,门口的村务公开栏内,还张贴着当年后陈村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《村务管理制度》《村务监督制度》。今年5月的后陈村的财务收支明细也贴出来了,几名参观者撑着伞透过玻璃认真地看。

每每路过此处,后陈村党员代表徐岳祥的回忆总会涌上心头。“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是站在公开栏前,特别关注了这两项制度,现场和大家讨论村里的收支情况,后来还跟我们一起座谈。”

一晃18年过去,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

心推动下,当年从后陈村孕育出的民主监督“金种子”,如今已经花开全国。后陈村也因此成了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“明星村”。

史无前例的创举

中午12点,参观的人群散去。徐岳祥带记者走进老办公楼内。正对门口的一楼办公室外墙上,“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”的牌子与党支部、村委会的牌子并排悬挂。记者注意到,村委会和党支部的牌子前面都被冠以“武义县白洋街道”,但村监会的牌子却没有这个前缀。“设置村监会这样与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并列的监督机构,在当时史无前例。”徐岳祥对记者说。

2000年前后,后陈村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,村集体一下子收入土地征用款1900余万元。但由于村干部重大决策不

公开、村务管理不透明、财务支出不规范,村民对村干部出现严重信任危机。

“那时候,村里的开支只需要村干部签字就能报销,招待费开支大,村庄建设却没起色。”当时的报账员陈金茂回忆。土地、村集体资产,这些村民最敏感的事情刺痛了大部分人的神经。由于财务管理混乱,群众上访不绝,900多人的村庄,红手印按了500多个,整个村子“硝烟弥漫”。直到,村里大胆创新,成立了村监会,通过村务监督管理制度规范村干部的行为、约束村干部的权利,乱糟糟的局面才得以好转。

每月财务收支公示、大小事务都在村监会监督下进行……村监会成立的当年,就为村里节支90余万元。公开透明的做事氛围,让原本紧张的干群关系得到了很大缓解。

2005年6月17日,在后陈村村监会成

立一周年之际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后陈村实地调研。他指出,在实践中创造的“后陈经验”,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,推进基层民主管理、决策、监督有机统一,实现村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程监督转变,使各种矛盾有了内部化解的机制,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。他鼓劲说:希望你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,为全省提供有益的经验。

2006年,后陈村荣获“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”。到2009年11月底,浙江全省3万个行政村全部挂牌成立了村监会。

(下转2版)

